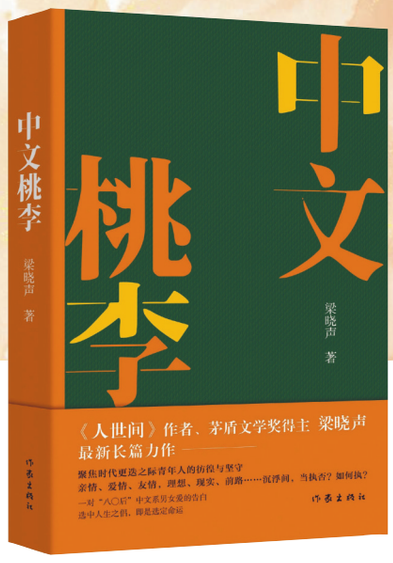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梁晓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中文桃李』的『青春之歌』

□韩传喜



梁晓声以一种饱含温情和宽容友善的态度来写这一代人，来写这一群人，写出了他们的青春气质，也写出了他们的成长蜕变，还写出了他们温暖而百感交集的代际和解。

作为文坛的常青树，梁晓声近几年大作频出。继广受赞誉的《人世间》之后，他于今年又推出了长篇新作《中文桃李》。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聚焦于"80后"一代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和生活历程，以中文系学生李晓东和徐冉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夹杂各种人事，生动立体地呈现出"80后"一代求学、恋爱、就业、定居和寻找生活真谛的人生镜像，书写了一曲"中文桃李"的"青春之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经典名言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和想象的空间，《中文桃李》便是尽得其妙。小说的题名"中文桃李"简洁明了而又韵味无穷，其中既有对中文的形象素描，又有对学子的生动画像，既有对生活的深切体悟，又有对时代的细致观照，中文与学子的映照、生活与时代的显影，在作品中巧缀妙联相得益彰，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

文学是人生的底色，文学可以成就人生。这是小说一个突出的主题。作为作家，梁晓声对文学的浸润作用深有感受，作为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对中文系的学生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书写"中文桃李"时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曾几何时，中文专业在高校是一个颇受欢迎、魅力十足的专业，才子才女云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文专业逐渐边缘化，已然风光不再。在选择中文作为专业时，"80后"学生真正喜爱文学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出于其他各种权宜之计，李晓东、徐冉和王文琪这一代中文系学生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中文专业的时代面影和尴尬处境。小说中的文学课教师汪尔淼恰似一股清流，这一形象的设定，重新强调了文学在浸润人心、培育灵魂方面的正向作用。汪尔淼的文学课不仅讲授知识，更多的是因文学而引发讨论和思考，通过探讨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电影《出租车司机》、雕塑《人马》，以及对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雪莱、拜伦、海涅等名家文本的细读和剖析，揭示出文学对人生的培基意义，意即"文学从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余留'给普通人的可再生资源"。汪尔淼对生活的全情投入、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对学生的循循善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将文学课流失的学生重新拉回到课堂，让他们感受文学的魅力，师生共同坚守着文学的家园。通过与汪尔淼教授一起办刊物、读作品、写文章、论思想、谈人生，"80后"中文学子们对自我的判断、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都发生了改变，文学所蕴含的真善美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无论青春还是成长，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文学都是他们应对生活的看家本领，是成就他们人生的重要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时代机遇，"深刻理解每一代人"，这是小说又一突出主题。《中文桃李》延续了《人世间》的"年代写作"方式。梁晓声和《人世间》中的"50后"是同代人，而和《中文桃李》中的"80后"则分明是两代人，作为长者的梁晓声，对"80后"显然宽容以待，抱以更多的同情之理解，"80后"既是他远距离审视的对象，又是近距离贴近的对象。小说既描绘"80后"的整体风貌，亦关注其个体差异，梁晓声没有对"80后"作简单的同质化画像，而是写出了他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文琪来自省会城市，出生于官宦家庭，见多识广，豪爽仗义；李晓东来自于地方小城，父亲是画家，母亲是中学教师，自律自省，善解人意；而徐冉则来自于郊区的菜农家庭，家境贫寒，自尊要强，他们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复合成为"80后"生动鲜活的群像。但无论来自哪里、出身如何、性格怎样，这些人物身上都闪耀着青春的光芒，映现出美好的品质。他们都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对尊严的守护、对友情的珍视，都有着青春的迷茫与困顿、人生的踌躇与彷徨。这样一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在自我与他人的融合中、在文学与生活的对接中完成了自己的青春序曲。梁晓声以一种饱含温情和宽容友善的态度来写这一代人，来写这一群人，写出了他们的青春气质，也写出了他们的成长蜕变，还写出了他们温暖而百感交集的代际和解。李晓东与父母之间的分歧，尤其因徐冉而引发的母子冲突，最终通过双方共同向好的努力而达成了和解。李晓东在父亲病危时毅然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父母，李晓东的母亲和徐冉的母亲这两个原本有着巨大生活区隔的人，因为儿女的幸福生活而成为相依相伴、亲密无间的姐妹。小说的最后，李晓东和徐冉与他们的女儿之间同样观点相左，已为人父母的李晓东和徐冉此时倍加珍惜代际之间的情感，他们以格外平和的态度包容着女儿。这些融汇在代际之间涓涓细流般的美好温情为小说增添了宽厚的气质，也为"理解每一代人"这一创作立场作了最好的诠释。

《中文桃李》延续了梁晓声小说一贯的平民立场，写出了一群小人物走在大时代里的平凡人生。李晓东和徐冉既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作品的一条引线，牵引出时代生活的千头万绪。梁晓声有写大时代和人世间的雄心和视野，和《人世间》相比，《中文桃李》人物更为单纯，叙事时间跨度也相对较小，即便如此，小说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性上，同样能够见出作家格局和视野的开阔。从地方小城到省会城市再到首都北京，从2000年直至当下，三个地理空间的转换和20年时间的变迁，小说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两条线索纵横交织，铺展开大时代的全息镜像。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社会的发展势不可挡，在大时代中，诸多如李晓东和徐冉这样的"80后"，作为平凡的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努力打拼，追求精彩的人生和生活的真谛。

小说的叙事进程其实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亦可视为"中文桃李"们人生的上下半场。上半场在学校，他们都是青春少年，谱写出自己的青春序曲和生命幻想曲。而走出校园，这些"中文桃李"们风流云散，各奔前程，谱写的则是青春协奏曲和生命咏叹调。"生活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如何选择因人而异。李晓东和徐冉毕业之后选择留在省会城市，后又为了理想和生计到北京打拼，经过生活的磨砺，在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他们最终选择了"报告文学类"的生活，放弃北漂回到家乡，并结为伴侣安居乐业，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心灵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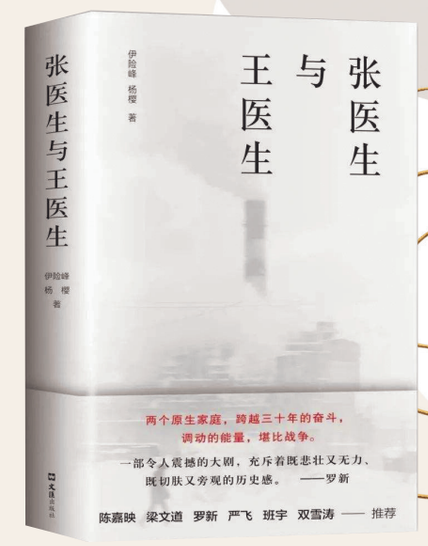
《中文桃李》不着意于故事的波澜壮阔、命运的大起大落、悬念的扣人心弦和高潮的此起彼伏，情节皆随自然铺展的叙述，不疾不徐而又流畅自如地展开，表面平静的叙述之中贯注着潜流暗涌的诗意，融汇着心同感应的共情，因而整部作品自然和顺的叙述层面之下，蕴蓄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张力。"中文桃李"的"青春之歌"注定婉转多致感人至深。

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呼愁与平民史诗

□刘 云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出了老沈阳40年间变革的忧伤记忆，两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也是整个时代的史诗。

史诗是实际空间上的跨越，呼愁是心灵的，所以这部书是社会学与心灵史的结合。



与我们熟悉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的东北虚构叙事不同，《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伊险峰、杨樱以第一人称叙述，用非虚构的形式打开了另一个东北世界。他们用记录的方式追踪了两位跟改革开放同龄医生的生活，以个案的方式折射东北在转折年代的社会图景。伊险峰和杨樱一起避开了媒体人追逐热点的习惯，选择从两个医生的生活角度切入，努力挖掘生活中真正的问题，即社会转型期间属于平民阶级的跃迁史。

在后记中，伊险峰提到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说："我们可将此种混乱的、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作者写作时回想起年少时的沈阳老屋，情感是属于个人的，却也是集体的，历经沈阳变革的两位医生似乎并不能理解作者对逝去故乡的怀想，感伤与怀旧的情绪像是呼在窗户上的雾气，不久便会消失，缅怀远去的老沈阳被视为个人的矫情，这种缺失的人文关怀不免引来愁思。写作或许是另一种记录方式，本书写出了"两个医生"之外的沈阳，包括城市本身的忧伤，以及属于沈阳人精神世界的挣扎，投射出自我与社会的种种问题，这部作品便蕴含着沈阳和沈阳人的呼愁。

首先是属于城市的呼愁，作者指出，对于沈阳而言，这是一个沮丧的时代，因为穷，信任体制也随之崩坍，大环境是动乱的，在破败的城市中，公交车超期服役，居民小区被盗，入室抢劫等事频频发生。书中提到交错的两个社会，"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沈阳，我们可以在张猛导演的电影《钢的琴》中了解其概貌，老工业基地和下岗工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凉基调。电影背景里频频出现的废弃钢铁，陈桂林和工友集体为女儿小元打造的钢琴，是用真材实料的铁制成的，也是集体、浪漫、理想和一个时代的荣光做成的，一架钢琴、一群工人演奏的是老工业凋零的挽歌。《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提到曾经作为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铁西区于2002年已经是"一潭死水"，面临着危机下唯有搬迁的窘境，"去工业化"的大环境之下，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当时人们遭遇的时代创伤。《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主要时空正是基于此，即中国改革年代，在老东北工业逐渐衰亡之下，工人子弟的挣扎与阶级跨越，书中提到的两个家庭历经失业、贫困等境遇，在婚姻、职业、子女教育和人际关系等漩涡中依旧努力经营生活，不成为"时代的废弃物"，这是跨越数十年的平民苦难史。

生存在老沈阳的平民命运也是呼愁的，他们受到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挤压。在时代的转折点，总有人被要求做出短暂的牺牲，在物质世界尚且贫困的情况下，个人意愿要屈从基本生活。张晓刚医生学军医也并非出自喜欢，而是为了帮家里省钱，张医生的妹妹张慧娟高考填志愿时，民航成了除她以外全家人的强烈意愿，更大意义上是因为有保障、工作稳定。父辈们也在承受时代给予的生存压力，在沈阳转型期，张医生与王医生的父亲成了没落的一代，母亲的能力和地位就更为凸显了。王医生的父亲王宝臣，一个依托大厂二〇四或者黎明的"单位人"，被人称为"劳模"，在社会变革中落败。母亲们在社会中似乎显得更为精明，她们有小活可以维持生存，拥有克里斯玛型人格的杨淑霞14岁便买了房子，在工厂中如鱼得水。虽然在90年代，电影院也衰弱了，在此之前，曾慕芝的一千零四张电影票却提升了家庭生活品质，她利用电影院职位之便和周围人交换物资，建立起了一个小型关系网络。

在忧伤的时代和个人命运前，张医生和王医生被缠绕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学着成为"社会人"，这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呼愁。平民的跃升之路环绕在关系网中，这张阶级跨越的社会网络图是繁杂的，其中潜在约定的规则成了社会契约式的存在，捆绑住所谓的"社会人"，张医生与王医生不断进行自我解构，游走在抗拒和顺从之中，成为"我们"和"他们"，"'我们'和'他们'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随时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定位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保持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洁净，同时——这可能确实不是很好——能在'他们'的世界里出入平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沈阳的单位文化形态有着工厂里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是一种熟人关系网络。尽管王医生努力挣脱关系泥潭，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切换，却也不可避免地在女儿王子琪的事上服软，为了女儿，实现几代人完整的阶级跨越，他得重新"巴结"这个社会，对于张医生来说，吃饭文化，即不能独自进晚餐成为他融入社会的方式。然而，与长袖善舞的母亲们相比，张医生与王医生在熟人网络上显然又是年轻的。在这场关于"社会和自我"的较量中，两位医生是忧伤时代下的胜利者，更多的平民命运或许是艰难而遗憾的。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出了老沈阳40年间变革的忧伤记忆，两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也是整个时代的史诗。作者笔下的平民史诗用生活细节表现了人物的奋斗史挣扎史，他们的幸运"出圈"，还有挣扎和残余不甘的心路历程，沈阳的渐趋衰颓和个人意志的向上形成一种张力，社会的落寞反而驱赶着他们不断往前。转型时代的沈阳人在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中不免忧伤，呼愁不仅是自我虽陷泥潭却努力挣扎的悲壮精神，也是一种怀旧情绪，是对已逝历史的追问与反思。史诗是实际空间上的跨越，呼愁是心灵的，所以这部书是社会学与心灵史的结合。

■第一感受

重说与重构

□茹 文

《柔石二十章》是以一个人的视角对柔石的重新构建和重新表达。在史料、情感和思想中寻找彼此之间的勾连、穿插和印证关系，重读杨东标的《柔石二十章》，依然具有历史调动力、智力参与感和思想启发性。以历史人物为对象的非虚构散文，魅力生发的基础是丰富详实的史料，对已消逝的历史人物的重构基础，是发生现场留下的断垣残瓦剩章残简，在历史废墟下找到这些材料，重新出土与组织，需要写作者如探案者一样的严谨科学精神和内在写作动力。

《柔石二十章》显示了作者对于史料的熟悉和传主的洞察，从《柔石传》到《柔石二十章》，中间是20年的时间沉淀，"20多年前的我，还算年轻。我走进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协图书馆，借到了《旧时代之死》《疯人》《三姐妹》等柔石早期的作品，一边埋头阅读，一边艰苦地抄写，抄写序言、后记、重要章节以及版权页——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出差的机会也少。一切有关柔石的资料，连同鲁迅的，'左联'的，都圈进我的视野之内。……我翻到了1931年2月7日的那张报纸，这是柔石等24位烈士遇难的日子，报纸上当然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那一天的上海气象预报说，这是38年来最冷的日子，连日下着阴沉而浓密的大雪。"（《柔石二十章·关于〈柔石传〉及其他》）。就在这一段文字的同页上面，放着柔石留存于鲁迅先生处、后最广为流传的那张照片，圆镜片眼镜后的眼睛里闪烁着纯真好奇温暖的光芒，带着作者脉动和报纸触感的文字与柔石遗像并置。书中第一章为读者呈现了30岁的青春遗容与死亡现场的猛烈撞击，引导读者感受近百年前传主生命曾经存在和骤然消逝的悲伤、遗憾和愤怒等复杂情感。

作者对柔石的重说和重构是客观、冷静和求实的，柔石性格气质的复杂性，到上海后柔石与冯铿的关系，柔石的笔名与革命工作关系，都求真自然无伪饰无拔高，力求在左翼文学史的特殊光环下重新还原柔石的真实存在，拨云见日，去伪存真，于推进对革命作家柔石的正确理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图书馆旧文库和存世者现场采访对话中搜集的日记、图片、文集、口述记录，《柔石二十章》穿越百年历史，理解和追念近百年前因政治暴力骤然消逝、停格在美好年华的一个年轻生命。

《柔石二十章》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是真正从柔石出发的土地上出发，追随、追想和追念柔石人生之路的人。中途介入不难，难的是天然契合。他是小时候上学走过相同城关石板路的同乡，是听方孝孺气节登同一座跃龙山的后辈，更是越百年深懂得的精神知音。地域性格、家庭出身、教育经历、个人气质、时代环境、人生追求、理想和信念的逐渐形成过程，种种方面，书中的每一章都有一个核心主题，互相解释，彼此关联，整体构成柔石短暂30年人生历程的七宝楼台。

整书叙述带着一种人与自身、与困境、与生而俱来的局限性始终作斗争的崇高悲剧美，作者对柔石生命的陨落过程和陨落所产生的悲剧崇高性是深深领会并情感共振的。关于柔石的家乡宁海，"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培育了这小县城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在狂波巨浪中，学得了狂放与勇猛；他们在丛林与巉岩中，学得了坚韧与挺拔"；关于柔石妥协的婚姻，"他的心上仍然挂着宁海的家，挂着自己结发的妻，有时送妻法兰绒一丈四尺，有时带一些作长袍或裙子用的布料，有时则寄些钱去。"细节达到真实，剪裁形成立意，叙述者的参与、在场、情感介入和精神共振提升艺术效果，赴龙华感受赴刑路和就义地的一段尤有感染力，革命青年在悲惨牢狱生活和对营救转机的期待中，被动迎接荒谬、暴力与凄凉的死亡将至，"龙华寺的钟声年年如故，敲着大慈大悲；桃花园里的花色岁岁常艳，映着至情至美。而与之相邻的却是残暴与邪恶。这种共存，岂非是一个被错乱了的怪诞？""对着萧瑟的土坑，我肃立着，静默了好久"。

物质生命的消逝是永恒的，人死不能复生；精神生命的影响是永恒的，精神突破物质的局限，形成超时空的回响。一个120年前出生的青年英雄已经牺牲，当我们重新书写他、重新解释他，最好的结果是超越纪念达到启示，超越崇敬达到理解，超越个体的悲伤达到普遍生命的领悟。《柔石二十章》至少三次引用鲁迅先生对于柔石为人特点与品德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革命行为是特定时代的选择，对自我品德的塑造和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具有穿越历史的永恒意义。一个自私的人不会轻易牺牲，也就不会被永久纪念。无私的牺牲是艰难的，也是稀少的。柔石早慧，又迂气，他是民国新思潮中海边县城走出的最早一批青年俊才，通音律，爱书法，爱读书，有前程；家庭、家乡和国家的现状、出门求学种种社会磨砺，又使他早早看穿求取功名利禄、坚持高洁品德和自我牺牲、帮助他人之间的重重矛盾。

26岁的柔石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社会是黑暗的，有的时候，做坏的人容易得便宜，做好的人吃亏。但我们因此做坏人么？不能够。"回望柔石生命历程的关键瞬间，我们不禁假设，在哪一些关口他能逃此一死？做出不同选择，将拥有寿终正寝功德圆满的俗世人生吗？1918至1923年就读浙一师时期的柔石，人生理想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家"，接近的是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叶绍钧及陈望道等文艺上有帮助的先生，同学是潘天寿、汪静之等艺术殿堂里的青年朝圣者并和他们志同道合。或许，本来，他是有可能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有思想的学问家"的。毕业后步入社会，客观上投考大学失败，国家动荡、民众苦难，他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苛刻、不甘放弃的艺术梦、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逐步把自己推到了时代革命的前沿，远离了稳健舒适的现实人生。《柔石二十章》以打乱的时间和情节中连贯的主题，呈现了一个生命的自我选择和自觉塑造过程。

"二十章"中有三章是讲述柔石与鲁迅，鲁迅深刻而决绝，他看人多准，看事多透，他的深情之可贵是因为睿智而不肯轻易动感情。《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动了悲伤和悲愤的真感情的，不仅是为革命为青年的牺牲而悲，更为艰难时代中正气、天真和利他精神的被绞杀而悲。从小城青年到浙潮先觉，到北大游学，到上海多伦多路的"左联"成立，东方旅社的会议被捕，到龙华刑场的30岁终结，内外部种种因素决定了柔石必然走过这一个历程，缺一环，都成不了柔石。柔石最终是以革命行为践行了艺术理想，他在《为奴隶的母亲》对如春宝娘一类底层小儿女苦痛的郁结于心，他在《早春二月》中对如萧涧秋一类青年知识分子自我牺牲的反向自问，都早早定格在了30岁。这终结是令人心碎的，是玉洁冰清的，也是惊心动魄的。再高超的艺术都比不过拿命去拼的实际人生所给出的答案，柔石对艺术之作用对革命之功用的追问，最终都统一在了30岁永远定格的热情、纯真和死亡中了。

《柔石二十章》的再版让120年前出生的人再次回到我们中间，这没有忘却的纪念，这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精神火焰。